

# 河道总督

(连载)



杨义堂

万历五年(1577年),黄河再次在淮安府北边的桃源县崔镇大决口,与此同时,淮安高家堰湖堤大坏,淮河全部南徙,淮、扬、高邮、宝应等处皆遭水灾。河漕尚书吴桂芳提议要恢复老黄河故道,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,束水归槽,两位主管领导治水理念不同,行动上便难以统一行动。

此时,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突然去世了,按当时的礼法,他要回籍丁忧三年。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孤儿寡母,张居正是他们的主心骨,朝堂是离不开张居正的。内阁另外两位成员中,吕调阳虽然很勤勉,但没有总领之才,张四维才华横溢,但是资历尚浅,难以服众。此时,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已五年有余,各方面都渐入正轨,朝政上下一股蓬勃之气,“万历新政”的各项改革正如火如荼,因此他三次祈求回老家守孝,万历皇帝三次拒绝。张居正又请求留在京城,夺俸守制,万历皇帝恩准了。夺情中的张居正在京城临时为父亲搭建了灵堂,一边守孝,一边主持内阁事务。

张居正召集河道总督傅希挚与漕运总督吴桂芳二人进京,让工部和六科的大臣们一起进行廷议,但是二位总督在朝廷上仍然争吵不休。张居正又将二人召集到灵棚里好言劝慰,但二人却都不相让,这下可把张居正气坏了,将吴桂芳一人留任,让傅希挚改任陕西巡抚,另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代任河道总督。不久,张居正又和工部、吏部堂官研究,决定裁革河道都御史,将河道与漕运两个系统合并,由一名都察院都御史总理河漕,提督军务,这样,就可统筹规划河道与漕运大计,

还有权弹劾沿线四省不称职的文武官员。

万历六年正月,皇帝下诏,让吴桂芳担任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、兼理河漕。可是,吴桂芳却在这节骨眼上突生重疾,不幸病逝了。河漕大业,岂能一日无人管理?张居正思来想去,此时除了有治河经验的潘季驯,再也找不出能治理黄河和漕运的能臣了,这才决定让潘季驯担任工部左侍郎、右都御史,总理河漕事务兼提督军务。

潘季驯收到朝廷的敕谕之后,想起第二次治河被罢官的遭遇,知道河官凶险,而在地方担任督抚或者在六部衙门做官都能相对平安,他身边的仆人施小九也是一遍遍地嘟囔他,让他千万不要答应。于是,潘季驯上疏请辞总河都御史的职责,说自己已经五十八岁了,经不起河道上往返奔波的折腾了。

万历六年(1578年)三月,张居正离京,回湖北江陵葬父,一路上浩浩荡荡南下,各省的抚按大吏纷纷越界迎送,各地的藩王也争相设宴盛邀。张居正在这繁忙的路途中,看了潘季驯的上奏,抽出时间给潘季驯回了一封短信:

河漕多虞,事关国计民生,是朝廷忧虑所在,总理河漕一职,责任重大,而时良兄谙习河道,素有才望,实在是找不出可以替代之人,五十有八,正是经验丰富,体力尚可,当为国所用,决不许汝辞职!

尔务必殚精竭虑,尽力区画,俾河漕无梗塞之虞,黎民免昏垫之苦,河成之时,必有重赏,以酬尔功。

尔其勉之!切切!



## 《去爱这热气腾腾的人间》

民警马拓已从业14年,他就像一名人间观察家,他喜欢观察辖区里的众生百态,携手撒欢的情侣、忙前跑后的保安、起早贪黑的早点铺阿姨……马拓发现,即使再普通的人,也有属于自己的波澜壮阔,他将这些感情融入文字,以66篇烟火气故事,记录这些用力生活的人。



## 《肆意生长》

本书是知名音乐人程璧的首部人生随笔集。从童年到为人妻母,从故乡到异乡,从校园到职场,程璧回溯成长历程,有幸有痛楚有星光有惆怅,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人生感悟。

加封制诏碑,又名大成至圣文宣王追封碑。该碑原文是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(公元1307年)颁布的诏书,后元武宗下旨要求全国各地文庙将此诏书刻石立碑,故该碑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均有存。曲阜孔庙中所存之碑立于大德十一年(公元1307年),现位于十三碑亭东起第四亭内中偏东,高2.47米(碑头高0.8米),宽1米,厚0.35米。龟趺高0.88米,长1.85米,宽1.02米。碑身曾残缺,后得到修复。碑文采用了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语言,自左向右竖写而成,共8行,汉字每行24字。此碑在碑石类别上属于功德碑,碑文内容主要是对孔子功德的赞颂。

关于碑文的作者,今人所编纂的《全元文》将其定为元成宗孛儿只斤·铁穆耳,但碑文作者其实并非元成宗。元成宗在大德十一年正月癸酉“崩于玉德殿”,而当时的翰林学士阎复作于至大三年(公元1310年)的《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》则提到了为孔子议定封号的时间——“大德丁未秋,近臣传旨,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”。至圣文宣王即孔子,据此我们可知为孔子加封这件事的提出时间应在“大德丁未秋”,即大德十一年秋,而在当年正月驾崩的元成宗不可能为这件事撰写碑文。阎复随后提到,“臣复职,当具草,既已颁示天下矣”。据此可知,碑文的主要起草者是阎复。同时,因为碑文中提到了“朕”,所以当时新登基的皇帝元武宗应该也参与了碑文的书写。

碑文内容较短,主要是对孔子功德的赞美。碑文开篇便提出“先孔子而圣者,非孔子无以明。后孔子而圣者,非孔子无以法”。这是对孔子的极高评价,历代文人学者对孔子的评价中,也只有朱熹



## 曲阜碑刻(二十三) 加封制诏碑

刘晓阳

的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能与之相媲美。随后碑文又赞孔子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,乃是“仪范百王,师表万世者”。而皇帝展现自己对孔子的敬仰之情的方式便是“举追封之盛典,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碑文最后,元武宗表达了“尚资神化,祚我皇元”的渴望。总体看来,该碑文虽内容较短,但是结构完整,很有章法。

碑文记载的元武宗决定加封孔子的时间也值得深究。元成宗驾崩后,元武宗于五月登基,而在七月便为孔子议定圣号,登基两个月便想要加封孔子,足以见其迫切程度。这一点我们可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做出解释。加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是元武宗对前代尊儒政策的一个继承,而元朝统治者的尊儒政策,其根本目的是安抚汉人、维护自身统治。汉人对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归属感很弱,大部分汉人都只是表面上服从元朝统治,并非真心认同元朝。这一现象威胁着元朝的统治,所以元朝统治者便实行尊儒政策,以期

通过儒家文化来获得汉人的认同感。碑文中所提及的“敬仰沐风”或许并非元武宗的真心之言,但是“祚我皇元”必是元武宗的主要动机。碑文所记“父子之亲,君臣之义,永惟圣教之尊”之言,揭示元朝统治者试图借助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,来使得人们重视“父子之亲,君臣之义”,以构建元朝统治的合法性。

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是历代政府不断强化的结果。自汉代“罢黜百家,尊崇儒术”之后,大部分帝王尊崇儒,期望借助孔子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,而尊孔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给孔子加封。汉和帝封孔子为“褒尊侯”,北魏孝文帝给孔子的谥号是“文圣尼父”,北周静帝进封孔子为“邹国公”,唐玄宗时孔子被封为“文宣王”,宋真宗时孔子被加封为“至圣文宣王”。元武宗将孔子一举加封为“大成至圣孔宣王”,“大成”一词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下》:“孔子之谓集大成,集大成也者,金声而玉振也。”碑文主要起草者阎复解释说:“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,为一大成之事,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。”除了西夏所封的“文宣帝”外,此封号几乎是我国古代皇帝对于孔子的最高封号。而通过对孔子的加封,元武宗也能一定程度上获得汉人的认同,提高政权的稳定性。

自汉以来,孔子的地位几乎一直在上升,根本原因是历代帝王对于儒家文化的利用。元代统治者加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,根本目的也是为了“祚我皇元”,巩固统治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元代统治者在利用孔子的形象时,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在反作用于元朝统治者,儒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元代统治者“汉化”的进程。